



大夏教育文存

# 常道直卷

主编 杜成宪 本卷主编 杨来恩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夏教育文存

# 常道直卷

主 编 杜成宪

本卷主编 杨来恩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夏教育文存. 常道直卷/杜成宪主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5675-5001-8

I. ①大… II. ①杜… III. ①教育制度—研究—世界  
IV. ①G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8360 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 大夏教育文存 常道直卷

主 编 杜成宪  
本卷主编 杨来恩  
策 划 王 焰  
责任编辑 金 勇  
责任校对 陈 易  
装帧设计 高 山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34  
字 数 57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5001-8/G·9310  
定 价 14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 《大夏教育文存》编委会、顾问名单

### 编委会

顾问 孙培青 陈桂生

主任 袁振国

委员 叶 澜 钟启泉 陈玉琨 丁 钢

任友群 汪海萍 范国睿 阎光才



常道直先生(1897 年—1975 年)

一

1951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建校时,也成立了教育系,这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之源。当时教育系的教师来自大夏大学、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沪江大学等高校教育系科,汇聚了一批享誉全国的著名学者,堪为当时中国教育理论界代表。如:国民政府在20世纪40年代曾实施部聘教授制度,先后评聘两批,各二三十人,集中了当时中国学术界各个学科的顶尖学者。两批部聘教授里均只有一位教育学教授,分别是孟宪承、常道直,后来都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任教,孟宪承还为华东师范大学建校校长;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出于“抗战建国”、保证中学师资培养的考虑,建立了六所师范学院,其中五所附设于大学,一所独立设置,独立设置的即为建于湖南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院长为廖世承,后来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上海师范学院(后为上海师范大学)院长;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奠定中国社会事业研究的基础的言心哲,曾为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后转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从事翻译工作;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后教育系第一任系主任曹孚,后为支持中央政府成立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奉调入京;主持撰写新中国第一本《教育学》、后出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的刘佛年……就是他们,共同奠定了中国现、当代教育理论发展的基础,也奠定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60多年的发展基础。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批著名学者当年藉以成名并影响中国现、当代教育学科发展的代表性成果大多未能流传于世,他们中的很多人及其著作甚至湮没不闻,以至今天的人们对中国教育学科的由来与发展中的诸多重要环节所知不详,尤其是对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对于中国现、当代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重要性知之甚少,而这些成果中的相当部分实际上又可以看成是教育理论和实践中国化探索的代表作。因此,重新研究、整理、出版这些学术成果,对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的学术传承、对于中国的教育学术传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华东师范大学建校之初,在教育系教师名册上的教授共有27位,包括教育

学和心理学两个学科。当时身任复旦大学副教务长的曹孚被任命为教育系主任,但由于工作原因晚一年到职,实际上教育系就有教授 28 位。除个人信息未详的二位外,建系教授简况见下表。

| 出生年代      | 姓名(生卒年)        | 建校时年岁 | 学历、学位 |
|-----------|----------------|-------|-------|
| 1890—1899 | 赵迺传(1890—1958) | 61    | 大学肄业  |
|           | 廖世承(1892—1970) | 59    | 博士    |
|           | 张耀翔(1893—1964) | 58    | 硕士    |
|           | 高君珊(1893—1964) | 58    | 硕士    |
|           | 欧元怀(1893—1978) | 58    | 硕士    |
|           | 孟宪承(1894—1967) | 57    | 硕士    |
|           | 谢循初(1895—1984) | 56    | 学士    |
|           | 黄觉民(1897—1956) | 54    | 硕士    |
|           | 萧孝嵘(1897—1963) | 54    | 博士    |
|           | 黄敬思(1897—1982) | 54    | 博士    |
|           | 常道直(1897—1992) | 54    | 硕士    |
|           | 沈百英(1897—1992) | 54    | 五年制中师 |
|           | 言心哲(1898—1984) | 53    | 硕士    |
|           | 陈科美(1898—1998) | 53    | 硕士    |
|           | 方同源(1899—1999) | 52    | 博士    |
| 1900—1909 | 赵廷为(1900—2001) | 51    | 大学预科  |
|           | 左任侠(1901—1997) | 50    | 博士    |
|           | 谭书麟(1903—?)    | 48    | 博士    |
|           | 萧承慎(1905—1970) | 46    | 硕士    |
|           | 胡寄南(1905—1989) | 46    | 博士    |
|           | 赵祥麟(1906—2001) | 45    | 硕士    |
|           | 沈灌群(1908—1989) | 43    | 硕士    |
|           | 朱有璩(1909—1994) | 42    | 学士    |
| 1910—1919 | 曹孚(1911—1968)  | 40    | 博士    |
|           | 刘佛年(1914—2001) | 37    | 学士    |
|           | 张文郁(1915—1990) | 36    | 学士    |

(本表参考了陈桂生《华东师范大学初期教育学习纪事(1951—1965)》一文)

可见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初建、教育学科初创时的教授们,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的15人,20世纪00年代的8人,10年代的3人;60岁以上1人,50—59岁16人,40—49岁7人,40岁以下2人,平均年龄50.73岁,应属春秋旺盛之年。他们绝大部分都有留学国外的经历,有不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其中博士8人,硕士11人,学士4人,大学肄业1人,高中2人。他们大体上属于两代学者,即出生在19世纪90年代、成名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代(五六十岁),出生在20世纪、于二三十年代完成学业的一代(三四十岁)。对于前一代学者而言,他们大多早已享有声誉且尚未老去;对于后一代学者而言,他们也已崭露头角且年富力强。相比较而言,前一代学者的力量又更为强大。任何一个高等院校教育系,如能拥有这样一支学术队伍都会令人感到自豪!

### 三

令后人感到敬佩的还在于这些前辈教授们所取得的业绩。试举其代表论之,以观全豹。

1923年,将及而立之年的孟宪承撰文与人讨论教育哲学的取向与方法问题,提出:教育哲学研究是拿现成的哲学体系加于教育,而将教育的事实纳入哲学范畴?还是依据哲学的观点去分析教育过程,批评现实教育进而指出其应有价值?他认为后者才是可取的。理由是:教育哲学是一种应用哲学,应用对象是教育;教育哲学研究导源于实际教育需要,是对现实教育的反思与批评,而其结论也需要经过社会生活的检验。这样就倡导了以实际教育问题为出发点的教育哲学,为中国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理论的转型,即从以学科为出发点转向以问题为出发点,转向更为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关注儿童,从哲学层面作出了说明。之后,不刻意追求体系化知识,而以问题研究为主、从儿童发展出发思考教育问题成为一时潮流。1933年,孟宪承出版《教育概论》,就破除了从解释教育和教育概念出发的教育学理论体系,而代之以从“儿童的发展”和“社会的适应”为起点的教育学叙述体系。在中国,以儿童发展为教育学理论的起点,其首倡者很可能就是孟宪承。1934年,教育部颁布《师范学校课程标准》,其中的《教育概论》纲目与孟宪承著《教育概论》目录几乎相同。而孟著自1933年出版至1946年的13年里共印行50版,是民国时期发行量最大的教育学教科书之一。可以看出孟宪承教育学思想对中国教育学理论转型、教育学学科建设、课程建设、专业人才培养和理论研究的深刻影响。



1921年,创始于美国、流行于欧美国家的一种新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道尔顿制传入中国,因其注重个别需要、自主学习、调和教学矛盾、协调个体与群体等特点,而受到中国教育理论界和中小学界的欢迎,一时间,诸多中小学校纷纷试行道尔顿制,声势浩大。东南大学附中的道尔顿制实验是其中的典范。当时主持东南大学附中实验的正是廖世承。东南大学附中的道尔顿制实验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严格按照教育科学实验研究方法与程序要求进行,从实验的提出、实验的设计、实验的实施、实验结果分析各个环节都做得十分规范,保证了实验的信度和效度,在当时独树一帜。尤其是实验设计者是将实验设计为一个与传统的班级授课制进行比较的对比实验,以期验证两种教学组织形式的长短优劣。在实验基础上,廖世承撰写了《东大附中道尔顿制实验报告》,报告依据实验年级各科实验统计数据、实验班与比较班及学生、教师的问卷调查结果,分析了实施道尔顿制的优点与缺点,得出了十分明确的结论:道尔顿制的特色“在自由与合作”,但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很难实行;“班级教学虽然有缺点,但也有它的特色”。廖世承和东南大学附中的实验及报告,不仅澄清了人们对道尔顿制传统教学制度的认识,还倡导了以科学研究解决教育问题的风气,树立了科学运用教育研究方法的楷模,尤其是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了如何对待和学习国外先进教育经验,深刻影响了中国教育的发展。此外,廖世承参与创办南京高师心理实验室首开心理测验,所著《教育心理学》和《中学教育》,在中国都具有开创性。

1952年曹孚离开复旦大学到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是教育系第一任系主任。1951年,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撰成的《杜威批判引论》出版。书中,曹孚将杜威教育思想归纳为“生长论”、“进步论”、“无定论”、“智慧论”、“知识论”和“经验论”,逐一进行分析批判。这一分析框架并非人云亦云之说,而是显示出他对杜威教育思想的深刻理解和独到把握,超越了众多杜威教育思想研究者。他当时就指出杜威教育思想的主要缺陷,即片面强调活动中心与学生中心,忽视系统知识的传授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对杜威教育思想有深入研究的孟宪承曾称道:“曹孚是真正懂得杜威的!”后来,刘佛年在为《曹孚教育论稿》一书所做的序中也评价说:“这是我国学者对杜威思想的第一次最系统、最详尽的批判。”曹孚长于理论,每每有独到之论。50年代的中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界,先是亦步亦趋地照搬苏联教育学,又对包括教育学在内的社会学科大加挞伐,少有人真正思考教育学的中国化和构建中国的教育学问题。曹孚在其一系列论文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教育学的学科基础包括哲学、国家的教育方针

政策、教育工作经验、中国教育遗产和心理学五方面;针对当时否定教育继承性的观点,他提出继承性适用于教育,因为教育既是上层建筑,也是永恒范畴;对教育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他批评以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为标准,从哲学、政治立场出发的评价原则,主张将哲学思想、政治立场和教育主张区别而论,主要依据教育思想来评价教育人物;他认为,即使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也不是一无是处,不能“一棍子打死”,也有可以吸取和改造的。在当时环境下,曹孚之言可谓震聋发聩。

1979年,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讨论稿)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新时期”全国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教育学教材。之前,从1962年至1964年曾四度内部印刷使用,四度修改。“文革”中还被作为“大毒草”受到严厉批判。1961年初,刘佛年正式接受中宣部编写文科教材教育学的任务。当年即撰写出讲授提纲,翌年完成讨论稿。虽然这本教育学教材在结构上留下明显的凯洛夫《教育学》痕迹,但也处处体现出作者对建设中国教育学的思考。教材编写体现了对六方面关系的思考和兼顾,即政策与理论、共同规律与特殊规律、阶级观点与历史观点、历史与理论、正面论述与批判、共性与特性。事实上这也可以作为教育研究的一般方法论原则。在教材编写之初,第二部分原拟按德育、智育、体育分章,但牵涉到与学校教学工作的关系,出现重复。经斟酌,决定按学校工作逻辑列章,即分为教学、思想教育、生产劳动、体育卫生等章,由此形成了从探索教育的一般规律到研究学校具体工作的理论逻辑,不失为独特的理论建构。1979年教材出版至1981年的两年间,印数近50万册,就在教材使用势头正好之时,是编者主动商请出版社停止继续印行。但这本教育学教材的历史地位却并未因其辍印而受到影响,因为它起到了重建“新时期”中国的教育学理论和教材体系的启蒙教材作用。

不只是以上几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创系教授在各自所从事的研究领域都有开风气之先的贡献。如,常道直对比较教育学科的探索与开拓,萧承慎对教学法和教师历史及理论的独到研究,赵廷为、沈百英对小学各科教学法的深入探讨,沈灌群对中国教育史叙述体系的重新建构,赵祥麟对当代西方教育思想的开创性研究,等等,对各自所在的学科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被载入学科发展的史册。还有像欧元怀,苦心经营大夏大学二十多年,造就出一所颇有社会影响的著名私立高等学府,为后来华东师范大学办学创造了重要的空间条件。所有前辈学者们的学术与事业,都值得我们铭记不忘。

## 四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将此次编纂《大夏教育文存》视为一次重新整理和承继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优良学术传统的重要契机。

我们的宗旨是:保存学粹,延续学脉,光大学术。即,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学术精华加以保存,使这些学术成果中所体现的学术传统得以延续,并为更多年轻一代的学生和学者能有机会观览、了解和研究前辈学者的学术、思想和人生,激发起继承和发扬传统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实现我们的宗旨。

就我们的愿望而言,我们很希望能够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一代代前辈学者的代表作逐步予以整理、刊布,然而工程浩大,可行的方案是分批进行。分批的原则是:依据前辈学者学术成果的代表性、当时代的影响和对后世影响的实际情况。据此,先确定了第一辑入选的11位学者,他们是:孟宪承、廖世承、刘佛年、曹孚、萧承慎、欧元怀、常道直、沈灌群、赵祥麟、赵廷为、沈百英。

《大夏教育文存》实际上是一部华东师范大学建校后曾经在教育学科任教过和任职过的著名学者的代表作选集。所选入的著作以能够代表作者的学术造诣、能够代表著作撰写和出版(发表)时代的学术水平、能够为当下的教育理论建设和教育实践发展提供借鉴为原则。也有一些作品,我们希望能为中国的教育学术事业的历程留下前进的脚步。

《大夏教育文存》入选者一人一卷。所收录的,可以是作者的一部书,也可以是若干部书合为一卷,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是代表性论文的选集,还包括由作者担任主编的著述,但必须是学术论著。一般不选译著。每一卷的选文,先由此卷整理者提出方案,再经与文存总主编共同研究商定选文篇目。

每一卷所选入著述,在不改变原著面貌前提下,按照现代出版要求进行整理。整理的内容包括:字词和标点符号的校订,讹误的订正,专用名称(人名、地名、专门术语等)的校订,所引用文献资料的核实及注明出处,等等。

每一卷由整理者撰写出编校前言,内容包括:作者生平、学术贡献、对所选代表作的说明、对所作整理的说明。每一卷后附录作者主要著作目录。

## 五

编纂《大夏教育文存》的设想是由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

己的历史和传统整理清楚,告诉后来者,并使之世代传递下去。实现这一愿望的重要载体就是我们的前辈们的代表性著述,我们有责任将前辈的著述整理和保护下来。他报请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办公会议批准,将此项目立项为“华东师范大学优势学科建设项目”,获得资助。还商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支持和资助,立项为出版社重点出版项目。可以说,范国睿教授是《大夏教育文存》的催生人。

承蒙范国睿教授和时任教育科学学院党委书记汪海萍教授的信任,将《大夏教育文存》(第一辑)的编纂交由本人来承担,能与我国现、当代教育史上的这些响亮名字相伴随,自是莫大荣耀之事。要感谢这份信任!

为使整理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我们恳请孙培青、陈桂生两位先生能够担任文存的顾问,得到他们的支持。两位先生与入选文存的多位前辈学者曾是师生,对他们的为人、为学、为师多有了解,确实给了我们很多十分有价值的指点,如第一辑入选名单的确定就是得到了他们的首肯。对两位先生我们要表示诚挚的感谢!

文存选编的团队是由教育学系的部分教师和博士、硕士生所组成。各卷选编、整理工作的承担者分别是:孟宪承卷,屈博;廖世承卷,张晓阳;刘佛年卷,孙丽丽;曹孚卷,穆树航;萧承慎卷,王耀祖;欧元怀卷,蒋纯焦、常国玲;常道直卷,杨来恩;沈灌群卷,宋爽、刘秀春;赵祥麟卷,李娟;赵廷为卷,王伦信、汪海清、龚文浩;沈百英卷,郭红。感谢他们在选编和整理工作中所付出的辛劳和努力!研究生董洪担任项目秘书工作数年,一应大小事务都安排得井然有序,十分感谢!

尤其是要感谢入选文存的前辈学者的家属们!当我们需要了解前辈们的生平经历和事业成就,希望往访家属后人,我们从未受到推阻,得到的往往是意料之外的热心帮助。家属们不仅热情接待我们的访谈,还提供珍贵的手稿、书籍、照片,对我们完成整理工作至关重要。谢谢各位令人尊敬的家属!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对文存出版的大力支持!也感谢资深责任编辑金勇老师的耐心而富有智慧的工作,保证了文存的质量。

感谢所有为我们的工作提供过帮助的人们!

杜成宪

2017年初夏

常道直是我国著名的比较教育学家,所著《各国教育制度》为其代表作。该书全面、客观地介绍了20世纪30年代以前,英国、法国、俄国、日本、德国、美国、意大利、丹麦等国的教育状况,并分析了各国教育制度的特点。此书与庄泽宣的《各国教育比较论》以及钟鲁斋的《比较教育》,代表着民国时期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的最高水平。在研究方法上,庄泽宣主要以“列国并比法”见长,钟鲁斋以“折中法”兼收并蓄,常道直则以“逐国叙述法”为主要特色。在此须加提叙的是,《各国教育制度》是在编著者其他著述,如《德国教育制度》、《法国教育制度》、《比较教育》的基础上,采择、补苴而最终完善起来的,可谓资料翔实、体大思精。然孟子曾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在具体介绍《各国教育制度》之前,本文愿对该书编著者的生平与学术生涯略加介绍。

常道直,字导之<sup>①</sup>,江苏江宁人<sup>②</sup>。1897年2月12日,生于一商贾家庭,兄弟中排行第四。父亲常子瞻为晚清秀才,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对子女的教育格外重视。幼时,常道直与三位兄长一道被送入私塾发蒙。在家中,常父亦亲自传授其儒家经典。1906年,两江总督端方在江宁创办同仁小学,常道直遂转入该学堂学习。之后,相继升读两江师范附属小学、江苏省立一中、江苏法政专门学校、金陵大学(文科)。1919年4月,杜威来华讲学,一时间教育改造社会之声响彻云霄,受此风潮影响,他决心改习教育。1920年1月,常道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科,成为该科首届学生。是年9月,担任《平民教育》杂志社编辑,宣传杜威的教育学说,并编译了《平民主义与教育》一书。翌年,经余家

① 导之是常道直的字。由于常道直在出版著作或发表文章时,常署名导之或常导之,故现有研究或教育辞书中常会出现讹误,将其作为曾用名或别名。此外,又因道直与导之在发音上颇为相似,民国时期就已出现诸多错误,如将其名误写作道之与导直。例如,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学术审议委员会审选部聘教授办法及送审名单(1946年)中的部聘教授名单(卷号02487)中,就将其名写为常导直;又如民国期刊《健与力》第4卷第12期的《对于体育的意见和理想:十二月三日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长导直对国立体育师范专校员生讲词》一文中,也写成导直。另一种错误,如1922年《社会学杂志》第1期第1卷的《中国社会纷乱原因之分析》一文,则误写成常道之。

② 今属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常道直祖籍江宁,出生时住址已迁至南京市区。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科同学录》与1924年《北京师大周刊》第228期《常道直启示》可知,常道直青少年时期的家庭住址在今南京市三牌楼群益里,属鼓楼区。

菊、陈启天、左舜生、杨钟健、苏甲荣五人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sup>①</sup> 1922年4月,高师毕业后,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聘请,负责《教育杂志》的“世界教育新潮流栏目”,译介、撰写了大量介绍西方教育最新成就与发展趋势的论文。此外,出于对推广民众教育的热诚,于1923年春,赴任江苏省平民教育促进会干事,与陶知行、徐养秋等人在南京近郊开展与推广民众教育。<sup>②</sup>

1924年7月,常道直通过江苏省公费留学生的选拔考试。1925年1月,辞却《教育杂志》与平教会职务,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留学,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主修教育行政、教育哲学与教育社会学。<sup>③</sup> 1926年,获教育学硕士学位,旋即前往英国伦敦大学深造。1927年夏,又转入德国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1928年秋,学成归国。

1929—1949年,常道直将主要精力投入在以下两方面:一是高校的教学工作。先后在安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大学任教,主要教授比较教育、教育哲学等课程,并根据学生学习与教学的需要,编订了《教育行政大纲》(1930)、《比较教育》(1930)、《增订教育行政大纲》(1931)、《新中华比较教育》(1934)等教材;二是教育学术团体的建设。与孟宪承、郑西谷、杨亮功等教育学者,倡议并组建了首个全国性教育学术团体——中国教育学会,并任常任理事兼驻会文书,主要负责“学会”的文书、公关及会员间的沟通工作,十余年亦复如是,堪称“学会之津梁”。除上述工作外,1943—1944年,常道直还担任了中等教育司司长,在抗战的艰苦条件下,组织兴办了21所国立中学,收留各战区流亡及失学青年。1947—1948年,被聘为西北师范学院与台北师范学院教授,定期前往两校讲学、授课。在百忙之中,他仍笔耕不辍,出版了《德国教育制度》(1933)、《法国教育制度》(1933)、《师范教育论》(1933)、《各国教育制度》(1936、1937)、《教育制度改进论》(1947)等著作。鉴于他在教育研究上的突出表现,经袁伯樵、汪德亮、孟宪承等15人之举荐,荣任教育部部聘教授。<sup>④</sup>

①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少年中国》,1922年,第3卷第6期。

② 常道直:《干部简历表》,华东师范大学人事处人事档案室。

③ 《常道直启示》,《北京师大周刊》,1924年,第251期。

④ 部聘教授荐举名单(油印件),学术审议委员会审选部聘教授办法及送审名单(1946年),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教育部档,全宗号五,案卷号02487。部聘教授的推荐和评选,为郑重其事,有章可循,教育部责成由吴俊升、傅斯年、吴稚晖、竺可桢等30余人组成的学术审议委员会,仔细研究,制定出《教育部设置部聘教授办法》。《办法》的第二条规定:一、在国立大学或独立学院任教授10年以上;二、教学确有成绩,声誉卓著;三、对于所任学科有专门著作,且具有特殊贡献。第三条规定,部聘教授须由教育部提经学术审议委员会全体会议出席委员2/3以上表决通过。部聘教授都是高教界的佼佼者,而且是中国相关学科专业的顶尖人物。(曹天忠:《档案馆里的部聘教授》,《学术研究》,2007年第1期,第113页。)

新中国成立后,常道直先后在四川大学、重庆大学任教。1951年10月,应孟宪承之邀,受聘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1956年,经李建勋、舒新城等人介绍,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58年,华东师大成立教育科学研究所,常道直任该所副所长。1963年,兼任外国教育史研究生班导师,孜孜不倦地为学生讲授西方教育名著,并将毕生所学悉数相传。1964年,华东师大西欧北美教育研究室(1972年更名为“外国教育研究室”)成立,任该室主任。1975年,因肺水肿,病逝于上海。

在了解常道直生平的基础上,对他的学术生涯与学术贡献作一番梳理,一方面,可以认识《各国教育制度》一书在其学术生涯中所处之地位;另一方面,也可进一步增进人们对常道直学术生命、学术贡献的了解。

### 常道直的学术生涯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北高师学习至担任《教育杂志》编辑时期(1920—1924)。他在北高师研究科学习期间,嗜读杜威的著作,并经常随侍在杜威夫妇左右。在与杜威近距离接触的过程中,杜氏的思想和人格魅力,给常道直留下了深刻印象。受杜威夫妇学说的启迪,他不仅与余家菊创办了《教育与社会》杂志,宣扬杜威的教育学说。尔后,该杂志与《平民教育》合并,他还继续担任编辑,先后发表了《学校之社会的任务》(《平民教育》1920年第24号)、《教育实验之重要》(《平民教育》1921年第31号)、《自动教育略说》(《平民教育》1921年第33号)、《学习与做事》(《平民教育》1921年第34号)、《游戏在教育上之价值》(《平民教育》1921年第35号)、《杜威夫人注意我国女子教育》(《平民教育》1921年第36号)等文章,而这些文章中所阐发“民治国的教育是为全体人民而设的,并非为特种阶级的人民而设的”、“提倡与注入式教育相对的自动教育”、“学业与校外活动是连贯一气的”、“注重个体的创造力与养成个体对于社会兴趣”的教育观点与《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所包含的教育意蕴可谓一脉相通。从中,我们可以明显见到常道直思想与行动中所折射出的杜威思想的影子。

1922年,常道直任《教育杂志》编辑,负责译介国外最新的教育趋势,这使得他的视野得到了极大开阔。在工作中,他不仅译介了诸多有关西方各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文章,如《德国之补习教育》、《英国盲聋教育之危机》、《剑桥大学成人教育论文集》、《美国纽约省之大学校与工人教育》、《测量教授的成绩》、《德维士的教授术》、《欧哈德的教授之方式》等,也使其涉猎了比较教育、性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等诸多教育研究领域。此时的他,开始学会独立分析教育现象



与教育问题,相继出版《社会教育与个性教育》(与王骏声合著)、《学校风潮的研究》(与余家菊合著)、《成人教育》(与任白涛合著)、《性教育概论》等著作。须加说明的是,在此阶段,常道直虽成果丰硕,但并未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对教育问题的分析虽有独到的见解,可又缺乏教育实践经验,很多观点都带有“书生式”教育家的味道。

第二阶段是在留学时期(1925—1928)。在留美期间,常道直跟随杜威,主修教育行政,这使得他对教育实际须有亲身的体验与细致的了解。在美国的近两年时间,常道直不仅参观了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哈弗福德学院(Haverford College)、布林茅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等高等院校,也考察了劳林斯维尼学校,弗莱明顿公学等中小学校。这种参观的教学方法相当于医科的临床实习,使所学的理论能直接应用到实际问题,对于美国的地方实际教育情形获得更进一步的了解。<sup>①</sup>细心的他将考察的每所学校的基础设施、课程设置、教职员情况、学校每年的经费开支与学校设置如实详细地记录下来。这些资料,经整理后,成为国内了解美国教育主要的资料来源。1926年,获得硕士学位后,他又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一方面,是为了对西方国家的教育行政有更全面的了解,探究其教育制度的渊源;另一方面,主要是想进一步研究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说。<sup>②</sup>在德学习期间,常道直的思想受到了赫尔巴特的影响,这从其晚年的研究旨趣与教学实践,也可以窥见。关于此点在第四阶段会详细阐释,这里便不再赘述。此外,留学期间,常道直考察了欧美诸国的教育状况,对美、英、德、法等国的教育行政、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补习教育、职业教育等方面作了系统的研究,并尤为关注各国教育制度的演进与教育专业化的进展。

留学欧美,对于常道直而言,可以说意义非凡,除了前文提及的使其对西方各国教育情况有了切身体会以外,实地考察也使其受到了较为全面的教育学专业训练。不仅如此,对于欧美国家的教育专业组织的运作,他也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并与李蒸、李建勋、李清悚、杨亮功等人组织在美留学生教育专业团体。这为常道直回国后在社会上推动专业认证和专业技能的权威,成功地把教育专业化的程序和比较教育、教育行政等学科移植到中国,提供了模板与借镜。当

① 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 五四》,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38页。

② 关于这点,深圳大学的张法琨教授也指出,常道直去德国留学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研究赫尔巴特。



时世界学术发展的趋势,赋予了常道直这代教育学人艰巨的使命,即促使中国的教育学科从译介走向编著,从移植走向创生。<sup>①</sup>

第三阶段是从留学回国至新中国成立(1928—1949)。归国后的常道直,深深地沉浸在教育学术研究之中。他先后受聘为当时国内的各大名校,教授教育哲学、比较教育等课程。在研究过程中,常道直特别注重对西方教育制度的研究,先后出版了《法国教育制度》(1933)、《德国教育研究》(1933)、《各国教育制度》(1936、1937)。此外,他还发表了《制度——贯彻理想的工具》、《学制之比较研究》等文章,阐述教育制度之于民族、国家的意义。这二十年中,常道直尽量使自己做一个“书生式”的教育家,勤奋写作,成果倍出,出版了多部比较教育学著作,并发表了诸多学术水平较高的论文。据不完全统计,截止至20世纪40年代初,常道直陆续出版学术著作十余部,发表论文二百余篇(见附录)。为此,他的学术研究水平赢得教育界同仁的一致认可,并颇具声望。1944年,教育部评选部聘教授,他当之无愧地荣膺此誉。

在此阶段,值得一提的是常道直为谋求教育专业“中国化”所作的不懈努力。20世纪30年代早期,中国研究事业迅速扩大,主要的学术研究机构(1916—1944)中,唯独没有教育。<sup>②</sup>此外,一些学术界名人,如历史学家傅斯年、植物分类学家胡先啸均表达了对教育学术性、专业性的怀疑,上述各种因素促使了常道直与孟宪承、陈剑修等一批教育学人,希望建立属于教育专业的组织机构。在美国留学时,他们组织的教育专业团体其实已经具备了雏形。通过数年的筹备,他们于1933年成立了中国教育学会。在数届学会的选举中,常道直连任理事、驻会理事或驻会文书,负责学会的具体事务,积极推动中国教育事业专业化,并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使得其时的教育学术研究的质量得到了较大的提升。1946年,常道直还代表中华民国教育协会理事会,出席在美国纽约举行的世界教育专业会议,并于世界教师会议席上发表演说,建议大会应为教师草拟一种职业伦理之国际法典。

第四阶段是任教华东师范大学(1950—1975)。这一时期,常道直的著作特别少,主要是以论文与手稿为主,尚未有公开出版的著作。新中国成立后,受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即美苏两极格局以及中苏关系的破裂,欧美等西方国家的

① 瞿葆奎,郑金洲,程亮:《中国教育学科的百年求索》,转引自常导之:《增订教育行政大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页。

② 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0页。